

中华学术文库

建元與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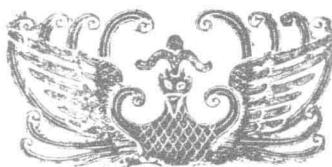
西汉新莽年号研究

辛德勇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学术文库



建元與改元

西汉新莽年号研究

辛德勇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 / 辛德勇著.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3. 7

(中华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09018 - 5

I . 建… II . 辛… III . 年号 - 研究 - 中国 - 西汉时代 IV . K234. 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9385 号

书 名 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

著 者 辛德勇

丛 书 名 中华学术文库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1/4 字数 337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018 - 5

定 价 47.00 元

中华学术文库

出版说明

“中华学术文库”收录中国传统人文学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范围为史学、哲学、宗教、社会、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及考古、出土文献等领域。文库崇尚朴实严谨，力避浮泛陈言，既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亦强调现代视角和问题意识，方法不拘一格，风格兼收并蓄。以期接续学术传统，彰显学术精神，鼓励学术创新，开辟学术新境。

“中华学术文库”面向海内外学术界征稿，实行学术委员会评鉴制度。由学术委员会提名两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评审，经专家评审的书稿，在获得学术委员会评鉴通过后，列入文库出版计划。

“中华学术文库”每辑三至五种，计划每年度出版一辑，视入选书稿确定，可以空缺。本文库由中华书局设立专项出版基金，并保障学术委员会的独立运作及文库的遴选和印行。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中华学术文库

专项出版基金暨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岩(中华书局)

委员*：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李 零(北京大学中文系)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

桑 兵(中山大学历史系)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巫 鸿(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

王汎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徐 俊(中华书局)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系)

* 以姓氏音序排列

自序

这本《建元与改元》，是由几篇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论文汇集而成的专题论文集。

我做过的研究，大多没有预先筹划，只是在胡乱翻书的过程中，偶得一闻，觉得能够对某一史事有所裁断，就动笔写下一时的看法。这些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文章，更纯粹出于偶然。研究汉武帝启用年号纪年的确切时间，是阐释汉代州制的副产品；研究王莽的年号，是考述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辅助工作；研究汉宣帝地节改元问题，则是梳理新朝年号过程中牵连带出的题目。文章虽然只有寥寥三四篇，论述起来，却是大费周章，不知不觉之间，竟然累积成书，年号研究，也就俨然成为我在历史地理学和版本目录学之外的另一项专业。

史学界广泛流行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之说，即谓研治中国历史，需要以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学与版本目录学知识作为入门的钥匙。没有入门的钥匙，自然无法登堂入室。年代学的内容当然不仅局限于年号，但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年号却是年代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时下通行的习惯，不妨采用“年号学”一称来界定那些与年号研究相关的问题，藉以体现它在年代学当中的分支地位。

这种年号之学，乍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实际上却是源远流长。东汉人应劭在注释《汉书》时，对西汉诸帝年号的寓意，即大多做有解说，堪称系统研究年号之第一人。唐天宝时人封演撰著《古今年号录》，“以肃宗至德、代宗永泰乃陈后主、齐明帝年号，为失于考据，遂起汉武建元至于唐，纂为一卷”（《玉海》卷一三《律历》），其书虽然久已失传，但旁观封演所撰《封氏闻见录》，考述各项典章制度和社会习俗，俱原原本本，要言不烦，自可想见《古今年号录》一书亦应约略相当。自此以后，考述年号的著述，层出不穷，其宋代以前名声昭著者，便有后蜀杜光庭撰《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北宋杨备撰《历代纪元赋》一卷、宋庠撰《纪元通谱》（又称《纪年通谱》）十三卷、章衡撰《编年通载》十卷、南宋晁公遡撰《历代纪年》十卷、侯望撰《古今年号录》五卷，以及王应麟写在《玉海》里面的一篇《历代年号》等。后来经历元明以至清朝，所成专书更不下数十种。迄至清代后期，尤以叶维庚《纪元通考》和李兆洛《纪元编》两书最为流行。

如邓广铭先生所讲的治史工具，年号只是纪年的标尺，编制出一份准确详备的年号表，似乎即可穷尽其事，这只能说是年号学研究中最表层的内容。然而，即使是这一层面的研究，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还存在很多难以澄清的问题，本书涉及的西汉新莽年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况且年号是天子神圣权威的象征，所关非细，如同本书各项研究所体现的那样，对年号问题的深入研究，必然触及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心理甚至帝王的生理状况等诸多问题。因此，年号学本身，乃是中国历史学殿堂中的一尊神祇，并不仅仅是为他人开启门扉的锁钥。在这一方面，业师黄永年先生撰写的《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这篇文章，透过看似平常的《赵氏夫人墓志》，阐明唐穆宗改元“永新”的历史真相，允称典范，亦足以说明年号学研究的丰富内涵。

面对年号学研究的广阔空间,我希望自己能够发现和解决更多问题,也相信会有更多同仁能够投身其中,从这一侧面,来揭示历史的面目。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汇集出版这些文章,较诸在期刊上刊登的文稿,大多做过不同程度的增删改订,若有学者引述,希望能够以此为准。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将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立项目,对本项研究给予了1万元经费资助,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中华书局的胡珂君帮助订正书稿中很多疏误。

2011年12月17日记

目 次

自 序	1
上篇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1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2
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7
三、《汉书·郊祀志》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10
四、释元朔年号所从出之天瑞	14
五、元狩始建年号说辨误	27
六、汉武帝以年号追记诸元的政治意图	37
七、司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号说	41
八、驳元封元年始增入元朔、元鼎两纪元说	45
九、论太初元年始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56
十、太初改制与年号纪年制度的施行	69
十一、相关纪年文物	74
附论 汉“元朔五年弩”鑄郭铭文述疑	102
一、所谓“元朔五年”与年号纪年起始时间的矛盾	103
二、鑄郭铭文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异同	105
三、铭文所署工匠和督造官员不符合汉代兵器铸造管理制度	111
中篇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119
一、问题的由来	120
二、判断改元时间的一般原则	128

三、改元前后年号特殊用例辨析	149	
四、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	165	
五、霍光专政与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	177	
六、宣帝亲政与地节改元	210	
下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 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241
一、秦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242	
二、孙吴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248	
三、王莽更改汉郡名称与所谓“鄣郡”	253	
四、字体风格、职官称谓与志墓铭文的性质	265	
五、东汉前期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	273	
六、“太初元将”与两字以上年号的省略记法	293	
七、金石材料的发现与天凤、地皇年号研究	301	
八、天凤、地皇两年号的本来面目	307	
九、所谓“上戊历”的由来	316	
十、“始建国天凤”年号之行用缘由	325	
十一、在“太初元将”与“始建国天凤”之间	341	
十二、所谓“三万六千岁历纪”与“始建国地皇”年号	356	
十三、馀墨零识	374	
【附】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	395	

上篇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 启用时间

关于中国古代以帝王年号纪年这一方式的启用时间，东汉人班固在《汉书》中所作记述，即已模糊不清，甚至还有明显的谬误。至迟从宋代起，相继有很多人做过考述，但核诸相关史事，迄今为止的各种说法，似乎都还不够允当，更缺乏对相关记载的深入考辨分析。近年我因在研究两汉州制的时候，偶然涉及这一问题，尝试提出了不同于时下通行观点和历史上各派见解的新看法。由于我的看法，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环节，写在拙著《两汉州制新考》一文当中^①，不关心古代政区地理的人，很少会去翻阅，而实际上这又是文史学界比较普遍关心并会影响到很多研究的基础问题；加之当时囿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论述，有很多重要的论证环节，还需要加以补充。所以，我想有必要将这一问题单独提取出来，详细增补史料，在这里予以更为全面的阐释，以便具体说明各项相关问题；同时，也供更多学者了解我的看法，相与切磋，提出批评。

^① 拙文刊载于《文史》2007年第1期，页5—75。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年号纪年，始自西汉武帝时期，这几乎是古今一贯的共同认识。虽然偶然可以见到个别人另外持有一些看似不同的看法，譬如清人赵翼尝有言曰：“周厉王出居于彘，公卿相与和而修政，号曰‘共和’，似此为年号之始。”^①但所谓号曰“共和”，不过是因为当时“王室乱，大臣行政”，史官没有办法用通行的周天子某王第几年形式纪事（与《春秋》诸侯某公第几年的纪年形式相当），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纪年方式^②。与赵氏约略同时人崔述即曾对此做有解释说：“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③可见，它与年号纪年本来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就连赵翼本人，在另外的场合，也同样表述说：“至武帝始创为年号。”^④因此，赵氏提到西周周、召两公摄政之“共和”与年号的关系，只不过是试图为年号制度追溯历史渊源而已，而他所能搜求到的踪迹，则只有这么一件似是而非的事例。

汉武帝行用年号纪年以前，普遍行用的纪年方式，是当时人记述某帝王在位期间的史事，只标记其在位年数，而无需标注出具体是哪一位帝王，曹魏人王朗谓之曰：“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⑤。

① 清赵翼《陔余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二五“年号重袭”条，页503。

②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482。

③ 清崔述《丰镐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畿服丛书》本）卷七，页125。

④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页38。

⑤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四《礼志》一，页333。

这种用法，源自当时人对在位的帝王一般尊称作“今上”。所以，比较庄重的用法，应当是写作“今上”或省称为“今”。书作“今上”的例子，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即屡屡称用；省写为“今”的用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编年纪”，写录于秦始皇三十年，其记述秦始皇时年代，即始自“元年”^①。由此再进一步简省，便是只标注年份而不称“今”字。当时各级各类衙署相互行用的文牍，由于官吏彼此之间不会产生歧误，通常都是如此。例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所抄录战国魏律，载录魏安釐王二十五年王命，即径作“二十五年”某月日云云^②；又如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汉简《奏谳书》所录秦至汉初高祖时期的司法案例，亦均但书某年某月某日，而俱无朝代、帝王之区别；张家山出土的西汉吕后二年律令，也是仅题作“二年律令”，不记其出自吕后当政时期^③。专门用于纪年的历谱，现在见到有张家山出土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诸年历谱竹简；另外，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文帝时期的帛书《五星占》，亦记有文帝初期诸年份。这些在当时写录的简帛，都是仅仅记作元、二、三年云云，也没有标注“今上”或是“今”字^④，这与敦煌出土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历谱起首即书作“永光五年”的情况^⑤，

^①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图版五〇之第 009 号简。

^②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图版一一二至一一三之第 694—706 号简。

^③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奏谳书》，图版，页 53—72，释文注释，页 213—231；又《二年律令》图版，页 7，释文注释，页 133。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历谱》图版，页 3—4，释文注释，页 129—130。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中篇第三章第七节《土星行度》，页 89—90。

^⑤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图版·小学术数方技书》，页 19；又《考释》一之《小学术数方技书·术数类》“永光五年历谱”，页 86—88。

适成鲜明对照。至于在更早的时候,反映这种纪年形式的铜器铭文,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西汉文帝以前,只有极个别人,如战国秦惠文王和魏惠王(即所谓梁惠王),于在位期间有过“改元”的做法,亦即中止正在行用的王年,启用另一元年,重新记其年数^①;其馀绝大多数君王,自始及终,都仅使用“一元”纪年,即如清人赵翼所云:“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无所谓改元者。”赵氏且谓“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实后世改元之始”^②。事实上,宋朝人高承早已谈到过这一点,谓“改元之始,由秦惠王也”^③。这种说法,实际上还不够准确。盖秦惠文王改元值周显王四十五年,而魏惠王改元值周显王三十五年,尚早于秦惠文王十年,只不过由于《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事阙佚其改元称王以后史事,这次改元,未能引起后世大多数学者注意,才会出现高承和赵翼上述说法。因此,魏惠王这次改元,也可以说是年号纪年最早出现的萌芽。

汉文帝在位期间改元一次,景帝改元两次,从形式上看,都是在沿承魏惠王或是秦惠文王的做法。不过,清人顾炎武、梁玉绳都早已指出,魏惠王和秦惠文王实行改元的原因,是“以称王之故”^④,

^① 秦惠文王改元事见《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7;魏惠王改元事见《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录西晋荀勗引“古文”(案应即古本《竹书纪年》)并唐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页1848—1849。

^②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五“改元”条,页516。

^③ 宋高承《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一“改元”条,页33—34。

^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七“梁惠王”条,页555—558。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三,页113—114。案《史记·秦本纪》和《史记·魏世家》之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记其改元事,都没有直接述及改元与秦、魏两国君主称王的关联,惟东晋孔衍在所著《春秋后语》(济南,齐鲁书社,1993,王恒杰《春秋后语稽考》点校敦煌卷子本)中叙述秦国史事(页44),乃径云“惠王十四年,初称王,改十四年为元年”,所记最能反映历史原貌。

即这两个人都是在由侯称王的时候改行新元，所谓“改元”不过是为了改侯年为王年^①。出土战国秦兵器中有“王三年戈”、“王五年上郡疾戈”、“王六年上郡守疾戈”和“王十年上郡守中(?)戈”这样一些题作“王某年”的铜戈，有研究者指出，这正是惠文王改侯年为王年后秦国为体现二者之间的区别而刻意为之^②。另外，在此之前，史籍中尚有西伯姬昌在周初受命称王而行改元之举的说法，后世学者，聚讼纷纭，迄今尚无定说^③，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种做法，或许即是师法于文王成规。然而，西汉文、景二帝并没有诸如此类的特殊政治需求，其何以要改行新元，从汉文帝改元的缘起当中，似乎可以看出端倪。

当时，赵人新垣平以数术干文帝：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④

宋人王林据此判断说，文帝改元的目的，就是“以求延年之祚”，而

^① 案雷海宗《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一文认为，像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样“因改君号而改元，与后代的改元不同，不能算作真正的改元。”雷文原刊《清华学报》，1936年11卷3期，此据作者文集《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25。

^② 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刊《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页310—335。

^③ 《史记》卷四《殷本纪》（页119）记西伯姬昌“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唐张守节《正义》引《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张氏复引述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后世持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其论辩最坚者，应属清魏源《书古微》（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卷六《〈西伯戡黎〉篇发微》（页6402）以及清俞樾《达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5，俞氏《九九消夏录》附印本）之《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页325—326）。

^④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3。

景帝改元同样也是本着这样的愿望^①；明人郎瑛亦以为这些帝王不过是“皆欲延年之意耳”^②。所谓“延年之祚”，其实并不仅仅是指帝王本人要万寿无疆，生命长驻，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延续国祚，希求皇图永固，亿万斯年。更易旧纪元、启用新纪元，意味着除旧布新，与民更始，因而是恒延其年的重要途径。如下文所述，在后来武帝元封元年的改元诏书当中，即清楚写有“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这样的内容；而西汉末哀帝建平二年时，待诏夏贺良等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哀帝因之下诏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③，所说尤能清楚显示上述内在因缘。

后世的历史著作和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对文帝和景帝所改行的新纪元，系分别标以“中元”、“后元”诸色字样，俨若后世之年号，故亦尝有个别人即此论述说：“古未有年号，始于汉文帝惑于方士新垣平玉杯之诈，改后元元年。”^④然而，宋人赵与时早已指出：“汉之诸帝，不过改元年耳。后人因其有二元，则别以为‘后’；因其有三元，则复冠以‘中’，非当时本称也。”^⑤清人顾炎武也考述说：“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记之为‘中’、为‘后’耳。”^⑥即系由记事者在事后书以“中元”、“后元”，以区分其重新开启之元年，而在当时，则不管其为前元、中元，后元，都一样但谓之“今上某年”，或是只称“某年”而已。

^① 宋王楙《野客丛书》(扬州，江苏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一一“汉诸君末年”条，页4b。

^② 明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九《辨证类》“改元”条，页275。

^③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卷七五《李寻传》，页3192—3193。

^④ 明颜文选注唐骆宾王《骆丞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灵泉颂》，页349。

^⑤ 宋赵与时《宾退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一〇，页127。

^⑥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后元年”条，页1536。

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汉武帝即位后，像这样的改元，变得愈为频繁；阴阳数术观念的支配作用，也变得更为明显，即如司马迁所说，武帝“尤敬鬼神之祀”^①。迄至元封，一直是每六年一改；太初以后，又改为四年一改元。旧史所见汉武帝行用过的年号，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延和），最后还有一个所谓“后元”。隋开皇时人费长房对此做有论述说：“自从开辟，三皇五帝，夏、殷、周、秦，迄文、景前，并以帝王标年，无别立号。至武帝世，始制年名，称‘建元’云。”这里所说“年名”，亦即年号，盖费氏另有表述云汉武帝“始建年号，称建元元年”^②。唐人颜师古亦尝就《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之年号注释云：“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③北宋真宗时王钦若等奉敕撰修《册府元龟》，同样以为“孝武肇创建元之号”^④，及神宗元封中高承论中国各项事物起源，也认为年号“始自汉武帝建元元年”^⑤。费长房、颜师古、王钦若和高承等人这样的说法，假如是指“建元”为史籍中年代最早的年号，固然不误，但伪题班固撰述的《汉武故事》，径称刘彻“年十四即位，

^①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 1384。

^②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发行《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史传部》印本）卷二，页 29—30。案费长房书作“始制年名”，是避忌与上文“无别立号”之“号”字重复，而清魏崧撰《壹是纪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清道光刻本）卷一《天文类》“纪元用号始于汉”条（页 146—147）亦称年号为“国号”，谓“汉武帝建元元年，后世人君有国号始此”，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用法。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页 156。

^④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一五《帝王部·年号》，页 169。

^⑤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年号”条，页 34。